

革命黨失要

一 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

(二) 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

孫先生的父親，是一個普通做小買賣的商人；生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（按達成公本舉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）。他父親爲人很好，什麼嗜好都沒有。他的哥哥——眉公體格很強壯，頭腦也很聰慧，但是自小不肯念書，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嬉笑頑皮，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。有一天，他那在檀香山經商的母親，有事回國。他父親因爲家裏很窮，兒子又不長進，就氣呼呼的請他母親帶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。父親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哥哥了！他的母親覺得小孩子頑皮，也是出於天性，年紀大了，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；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，事情辦理妥了就帶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。

孫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後，一變常態，倒很能够循規蹈矩，做些事情。起初在人家做田工，照中國的方法去耕種田畝。本來在五六十年前，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。人口稀少，棄地很多。政府爲了獎勵墾荒，隨便什麼人，都很容易領田的。所以他的哥哥，替人家耕了幾年田以後，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，去領了些田畝來耕種。這樣，耕了幾年，倒也賺了一點錢，有一點積蓄了，於是就到茂宜 Māui 島去。茂宜島，是夏威夷羣島中五大島之一，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島，就向政府租了許多地畝闢爲山園，經營畜牧耕種事業，倒也順手。又因爲他爲人輕財好客，遇事有決斷，同島人多服他。所以後來島上的人，就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「茂宜島王」（"King of Maui"）。

孫先生在十二歲的時候，他的哥哥回來，就帶他到檀香山去。本來孫先生在家鄉的舊書塾，已讀過三四年的中國書。這時候，到了檀香山，因爲沒有中國學堂，所以在白天就進一個教會學堂，學習英語。晚上回家，溫習功課後，他還是勤讀中國書。

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哥哥，很反對耶穌教——他的反對，並不是有什麼理由，不過他以爲

只有中國的教化最好，除了中國教化以外，無論什麼教，都是不正派，都要反對的。而孫先生在教會學堂讀了幾年書，受牧師的熏陶，到十八歲，就進了教。不久被哥哥知道，當然要大生氣，就叫孫先生趕快反教并要退學。孫先生不肯，他對他的哥哥說：「現在我既已進了教，怎麼可以反了過來？並且我進教，也和你沒有關係，為什麼要干涉我呢？」這樣，兩個人門起口來，孫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頓。打過以後，哥哥不理他。孫先生倒也負氣起來了，就拿了一隻衣箱，頭也不回的跑出門。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好呢？摸摸身邊，也沒有錢。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。後來就跑回到教會學堂裏面去。見了牧師，就說：「我哥哥不要我讀書，我現在站不住，要回去了」。牧師聽了，很憐惜他。苦苦的勸他：「你暫時住在學校內罷，隔幾天，等你哥哥氣平了，再可以去商量的」。但是那時候孫先生覺得既和哥哥鬥氣出來，再也不能住下去了，並且出國已六七年，很想回去見見家鄉情況；所以他還是很堅決的要回國。牧師見勸不住，就幫助了他的船費，使他回到中國來。後來他的哥哥知道了，覺得

孫先生的學費。

(二)香港之求學時代——革命思想之發源

孫先生到了中國，就在香港繼續攻讀。孫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讀書。起初在香港讀書的學堂，就是皇仁書院。皇仁書院是那時最有名的中等學校。不久他就回到廣州進博濟醫局附設的醫學校學習。校裏書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。在這個學校，孫先生遇見一個同學鄭士良。鄭士良是客家人，也是三點會會員。本來在廣州的客籍人，多半加入三點會。會中的口頭語，就是「反清復明」。其實這「反清復明」四個字，究竟怎樣意義，在那時候的會員，能夠明瞭的，已經很少很少。當時孫先生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，又是志同道合，所以兩個人很稱莫逆。但是孫先生也只有和鄭士良一個人，可以談天，其餘就都是話不投機了。

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，大約讀了兩年書，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。這個雅麗氏醫院，怎麼樣成立的呢？當時有一位何啟博士，在英國讀書，畢業後，就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 Alice 為妻。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，遺下幾萬塊錢的產業。何啟博士抱茲益之痛，

非常傷心，很不願意得到他妻的遺產，所以就代他捐產興學，修了一個醫院，名之謂雅麗氏，以誌紀念。同時在醫院內，附設一個醫學堂。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。現已改組為香港大學醫學部。廣招中國學生入學習醫。何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，吾等之師也。

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，雖得鄭士良日夕暢談，很覺有味；但在廣東省城，耳目衆多，言論也很受束縛。不如在香港，較為自由。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，即由博濟轉入。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。他進校以後，天天談革命。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。或有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，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。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。叫他「洪秀全」。因為孫先生平時，常常談起洪秀全，稱為反清第一英雄，很可惜他沒有成功！

孫先生在雅麗氏醫學校讀了兩年。那時，我在廣州念書。有一天，我有事到香港去。在沒有到香港去以前，在廣州見到一位姓區的老友朋。這位老朋友，既是認識我又是認識孫先生的他說：「你到香港，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，這個人恐怕同你見解很相合的」。我說：

「很好」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。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。到了香港，就請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牧師，領我到雅麗氏醫學校內見孫先生。王煜初介紹過我們之後，就告辭去了。孫先生見了那封介紹信，就很高興的同我談話起來。大約經過十分鐘，我就說「我們去逛逛公園吧！」我當時初次到香港，也不知道什麼，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，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，兩個人坐下，談談時局，覺得很入聽，談到革命的事，也是很相投，最後他就問我：「這次到香港，要耽擱多少天？」我說：「只有一天，馬上要走的」。他就說：「無論如何要想法常常談談。」這樣分別以後，過了幾個星期，我自己因為家境日就艱困，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，減輕家裏的負擔。一到了香港，當然時常到醫院裏去，在孫先生的宿舍內談天，天天談革命的事，總是很高興的。

孫先生那時碰到我，常常勸我學醫，說：「醫學是很有用的」。我因為習性不近，總是不願意。有一天。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，他忽然說『請你坐坐。教授來了，我要聽講去。散課後，再回來同你談天』。隔了一回，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：「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」。

康德黎博士，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。我說：「不認識他」。他說：「有事情才請你去」。我說：「人既不認識，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？」他不待我講完，就抓了我的衣袖，拉到教務長室內見康德黎博士。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，說：「我們是很歡迎你的」。其實他所說的歡迎，是因為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。那時我又蒙在鼓裏，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，無從致答。只說：「Yes, thank you」而已。後來我們就退出來，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，孫先生說：「好了，你進來念書，大家可以多談了」。我沒有辦法，就答應下來，轉入雅麗氏醫學校。其時，我所讀的一班，比孫先生差兩年。

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

的事，所以中國僑民差不多個個有些政治思想」。並且，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羣島合併，夏威夷羣島的人民，就天天在那裏反抗，僑民看慣這種事情，當然更大受影響。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。後來孫先生回到中國來，看到中國情形不對了。所謂『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強；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朝庭則鬻爵賣官，公行賄賂；官府則剝民刮地，暴過虎狼』。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，調弄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國，孫先生傷心之餘，以為國家為什麼這樣衰，政府為什麼這樣糟，推究其故，就是政府的權柄，握在異種人——滿洲人手裏。

如果拿回來，自己去管理，一定可以辦好。同時孫先生又感覺到：當時洪秀全的事業，可惜半途失敗；否則他能够成功，由中國人當權，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，所以心裏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。這些，恐怕就是孫先生革命思想的起點了。

當時任廣州和孫先生談天的是鄭士良，在香港就是我。後來在雅麗氏醫學校畢業，到上海去，就碰到陸皓東。陸皓東在上海為電報局的領班生，因為陸皓東家鄉就在孫先生翠亨村的鄰近，大都是同鄉，所以一見就很投機的。

(三) 雖校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

孫先生求學的用心，實為我所僅見。在雅麗氏學校讀書，平時無論什麼學科，都是滿分。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，其中祇有一科是九十幾分。校中教員與考試官就為他開了一個會議，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，學科中大部分是滿分，祇有一科稍為欠缺些，似乎是美中不足，會議結果，他們就送給他幾分，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。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「滿分」的（這張證書，英文是校長寫的，中文是我填的）。

孫先生畢業以後，他想開藥房，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。這件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，就禁止他。因為照他們英國的習慣，醫師的地位很高，稱為上等人，做買賣的人，就比較低賤了。所以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，對他說：「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。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。因為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，應該自愛！」這樣一來，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。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，掛牌行醫了。很奇怪，不滿兩三月，聲名鶴起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，極端欽佩的。就診者戶限為穿，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，竟

有一萬元之多；但是他並不積蓄，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，以致賺來的錢，到手就完。孫先生一面行醫，一面還是要開藥房。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，在廣州繼續開一家，再在石岐也開一家。我沒有辦法阻止他，就幫幫他的忙。到第二年，他就把店裏事務，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，這樣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，竟把孫先生的醫金，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。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够了，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來維持。

(四)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

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廣州，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：「孫先生失蹤了，藥房中開銷很難，收入不敷，只賸十幾塊錢」。我接到信，就到廣州去，替他維持店務。等了多天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心裏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來了。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，他見了我就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我問他：「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他說：「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！」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，我拿起來一看，紙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。我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隨

便稍爲修改一下。以後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。我沒有辦法，就讓他去。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，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。

孫先生到了上海，找着了一個香山人，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（字陶齋），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。有一天，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（號紫詮，別號天南遜叟）。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灑博士 Dr. Legge 譜譯四書五經。灑博士回英國，也請王韜同去，在英國住了幾年。後來回到香港，爲循環日報主筆。再回上海來，聲名很盛，筆底下對於世界智識，也很充分。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，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，一見如故，就把他那篇大文章，同王韜商量起來。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。

這時候，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。王韜就寫了一封信，介紹孫先生到天津，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，同老夫子商量商量，或者可以見李鴻章。孫先生快樂極了，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。那時候，剛剛中日大戰，打得很厲害，李鴻章至蘆台督師，軍書旁午，老夫子把孫先生的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，李鴻章是否看過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過後來李

鴻章說：「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！」孫先生聽了這句話，知道沒有辦法，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。陶齋看見了，就替他想方法，到江海關領了一張護照，請他出國去設法，孫先生也就乘船到檀香山去了。

附錄：孫先生上李鴻章書

竊文籍談粵東，世居香邑，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。幼嘗遊學外洋，於泰西之語言、詞、文字、政治、禮俗，與夫天文地輿之學，格物化學之理，皆略有所窺；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，化民成俗之規。至於時局變遷之故，陸鄰交際之宜，輒能洞其窽奧。當此民氣日開，四方畢集，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，朝廷勤求政理之日，每欲以管見所知，指陳時事，上諸當道，以備芻蕘之採。嗣以人微言輕，未敢遽達。比聞國家舊求富強，百事之術，日異月新，不遺餘力，曖曖乎將與歐洲並駕矣。快艦、飛車、電郵、火械，昔日列強之所恃以凌我者，我今亦已有之。其他新法，亦接踵舉行。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

經，當國強兵之遠略，在當局諸公，已籌之稔矣。又有昭車四出，則外國之一舉一動，亦無不週知。草野小民，生逢盛世，惟有遞遞歡呼，聞風鼓舞而已，夫復何所指陳。然而猶有所言者，正欲乘可爲之時，以竭其愚夫之千慮，仰贊高深於萬一也。

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，不盡在於船堅，砲利，壘固，兵強，而在於人能盡其才，地能盡其利，物能盡其用，貨能暢其流。此四事者，富強之大經，治國之大本也。我國家欲恢擴宏圖，勤求遠略，彷行西法，以籌自強，而不急於此四者，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，是舍本而圖末也。

所謂人能盡其才者，在政養有道，鼓勵以方，任使得法也。

失人不能生而知之，必待學而後知。人不能皆好學，必待教而後學，故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所以教養之也。自古教養之道，莫備於中華，惜日久廢弛，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。泰西諸邦，崛起近世，深得三代之遺風，庠序學校，遍佈國中，人無貴賤，皆奮於學。凡天地萬物之理，人生日用之事，皆列於學之中，使通國之人，識而習之，各就性質

之所近，而致力焉。又各緣有專師，津津啓導，雖理至幽微，事至奧妙，皆能有法以曉。諭之，有器以窺測之，其所學由淺而深，自簡及繁，故人之靈明日廓，智慧日積也。質有愚智，非學無以別其才；才有全偏，非學無以成其用。有學校以陶冶之，則智者進焉，愚者止焉。偏才者專焉，全才者普焉。蓋賢才之生，或千百里而見一，或十萬人而有一，若非隨地隨人而加教之，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，以至於湮沒而不彰，泰西人才之衆多者，有此教養之道也。且人之才志不一，其上焉者，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，則雖處布衣，而以天下爲己任，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，卓異自立，無待乎勉勵也。所謂豪傑之士，不待文王而猶興也。至中焉者，端賴乎鼓勵以方。故泰西之士，雖一才一藝之微，而國家必寵以科名，是故人能自奮，士不虛生。逮至學成名立之餘，出而用世，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，學報以進其益，萃全國學者之能，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，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，翻陳出新，開世人無限之靈機，闡天地無窮之奧理，則士處其間，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？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，創一新器，必邀國家之上賞，則其國之士，豈有不

專心致志者哉！此泰西各種學問，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，有此鼓勵之方也。

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長，則姪智者無以稱其職，而巧者易以飾其非。如此用人，必致野有遺賢，朝多倅進。泰西治國之規，大有唐虞之用意。其用人也，務取所長，而久其職，故爲文官者，其途必由仕學院；爲武官者，其途必由武學堂。若其他，文學淵博者爲士師，農學熟悉者，爲農長，工程練達者，爲監工，商情講習者，爲商畫，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。總之，凡學堂課此一業，則國家有此一官，幼而學者，即壯之所行，其學而優者，則能仕，且恪守一途，有陞遷而無更調。夫久任則閱歷深，習慣則智巧出。加之厚其養廉，永其俸祿，則無瞻顧之心，而能專一其志，此泰西之官無苟且，吏盡勤勞者，有此任使之法也。故數養有道，則天無枉生之才；鼓勵以方，則野無抑鬱之士；任使得法，則朝無倅進之徒。斯三者不失其序，則人能盡其才矣。人既盡其才，則百事俱舉，百事舉矣，則富強不足謀也。秉國鈞者，盍於此留意哉！

所謂地能盡其利者，在農政有官，農務有學，耕耨有器也。

夫地利者，生民之命脈，自后稷教民稼穡，我中國之農政，古有專官，乃後世之爲民牧者，以爲三代以上，民間養生之事未備，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。三代以下，民間養生之事已備，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，便爲善政，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。農民祇知恆守古法，不思變通，墾荒不力，水利不修，遂致勞多而穫少，民食日艱。水道河渠，昔之所以利農田者，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。如北之黃河，固無論矣，即如廣東之東、西、北三江，於古未嘗有患，今則爲患年甚一年，推之他省，亦比比如是。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，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，欲修之而力不逮，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空數而已。年中失時傷稼，通中計之，其數不知幾千億兆，此其耗於水者，固如此其多矣。其他荒地之不開，山澤之不治，每年遺利，又不知凡幾。所謂地有遺利，民有餘力，生穀之土未盡墾，山澤之利未盡出也。如此而欲致富，不亦難乎？秦西各國深明致富之大源，在於無遺紳利，無失農時，故特設專官，經略其事。凡有利於農田者無